



中共濮阳党史资料

中共濮阳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濮阳党史资料

第一集

中共濮阳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二月

前 言

濮阳县一九二六年前就有了党员的活动，一九二七年建立了中共濮阳县委。从此以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长期艰苦曲折的革命斗争中，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创造了不朽的光辉业绩。

我县的党史资料征编工作，在县委领导下，在革命老同志热情帮助及有关单位大力支持下，近两年来，征集到大批珍贵的党史资料。这些资料是研究编纂濮阳县党史的依据和基础，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教材。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较为全面系统了解党领导濮阳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事迹，我们将这些党史资料汇编成册，陆续刊印。

《濮阳县党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理应将在濮阳参加革命和入党较早的老同志的有关资料全部编入，奈因有些资料，现正在调访整理中，因而未能如愿，特表歉意。对某些有争议的材料，我们采取多种说法并存，以便知情者进一步回忆考证达到统一。

在汇集中，承蒙许多老同志的积极支持和有关部门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於我们水平所限，错误和欠妥之处难免，诚望指正。

中共濮阳县委党史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二月

目 录

关于濮阳党的建设的回忆·····	赵纪彬遗作 (1)
刘汉生同志的回忆·····	(5)
王从吾同志的回忆·····	(2 2)
沙区革命斗争的回忆·····	平杰三 (3 6)
红旗飘在濮阳	
——回忆在濮阳坚持革命斗争的时候···	刘晏春遗作·····
·····	(4 6)
我在濮阳两门一带领导农民运动的回忆·····	田园 (6 7)
濮阳党的历史资料·····	史向光遗作 (8 1)
濮阳二区党的活动情况·····	徐志一 (1 2 7)
对抗战战争一段的补充材料·····	张泽民遗作 (1 3 6)
党在姚家一带的发展与活动·····	贺霖良遗作 (1 4 0)
党在顿丘县的工作情况·····	牛万里 (1 4 6)
关于濮阳地区革命历史的回忆·····	宗凤鸣 (1 4 9)

1937——1940年濮阳县党组织工作的回忆	王先周遗作 (170)
1930——1944年中共濮阳党史回忆	高连庆遗作 (173)
濮阳温邢固事件及其周年纪念大会	(181)
濮阳盐民斗争…王从吾 高克林 张会之 <u>吴宝奇</u>	(193)
回忆在濮阳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时候	王鹏程 (205)
忆革命和尚吴德馨同志	<u>史向光</u> 常耕民 (214)
奇袭八公桥	潘炎 (225)
回民支队在八公桥战斗中	张同钰 (232)
对“奇袭八公桥”战斗的片断回忆	刘子明 段美敏 靳志海 (235)

关于濮阳党的建设的回忆

赵纪彬 遗作

一、关于大名特支

大名特支的成立，要从大名七师校长谢台臣说起。谢任七师校长之前，曾在保定高等师范任中国史教员，并兼附中教员。附中学生冯品毅，跟谢关系较好。毕业之后，冯考入北师大英语系学习，并在该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党派冯品毅同志到大名发展党的组织，这时谢已任七师校长，因冯与谢是师生关系，就被谢聘为七师英语教员。冯到七师后宣传党的主张，培养党员对象，这年秋，冯要离开七师到上海工作，在他走的前几天，我和刘大风、李大山找到冯老师，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他同意了，发展我们为中共党员。

冯走后，刘大风等暴露了党员身份，~~训育~~教导主任王振华问刘大风，刘说：“我们是C P”。王向谢汇报后，谢吃了一惊，就把~~教~~主任晁哲甫、王振华和总务主任高绍堂召集到一起开会研究，谢说：“我们还不是党员，又不懂，出了事，我们是有责任的，叫他们参加北伐去吧。”

我和刘大风、李大山到了北方区（北京）汇报工作，请求参加北伐。但北方区不同意，说：“你们走了，大名的工

作怎么办？”因为刘大风坚决要到南方去，认为我和李大山也能把大名的工作顶下来，结果北方区同意了刘大风到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请求。刘大风绕道上海，见到了冯品毅同志。

我和李大山仍回大名。回去之前，北方区领导同志指示：回去后成立大名特支，属北方区直接领导。我负责宣传，李大山负责组织，成润负责青年，书记另派。这里我想顺便提及一下，我们到北方区要求参加北伐，谢校长是很清楚的，可是要我们回大名之前，他却机智地给我们写信说：

“你们在北京听讲演已久，结束之后，马上返校，以免荒废学业，寄款六十元，为路途盘费。”至今回忆起来，还感谢谢校长对革命事业的赤心。后来北方区派了北京法学院学生李素若（濮阳人）任特支书记，大名特支一九二六年冬建在七师。

特支建立后，北方区有两条重要指示：

①所有党员都要跨党，以三大政策为标准，发展一批左派国民党员，壮大革命力量；

②把工作重心，从学校转移到农村，做红枪会的工作，掌握武装，迎接北伐。

这两条指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我们的工作路线。根据这两条指示，我们以三大政策为标准发展了一批左派国民党员。所以大名的党，是先有共产党，~~所有左派国民~~党。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大名发展的左派国民党员，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反共，就是这个原因。

一九二六年底，特支发展谢俞臣、晁哲甫、王振华、高绍堂为共产党员。解云山、裴自耕是特支建立前发展的党员。

）。一九二七年麦前，红枪会占领了大名城，麦后奉直军阀孙殿英又打了回来，占领了大名城也占领了七师，学校被迫放假，学生回家。回家后就搞农民运动，党组织也就从学校发展到了农村。

二、沙区建党

沙区建党需从红枪会攻大名城说起。一九二七年麦前，红枪会攻打大名。李素若说搞农民运动跑回濮阳去了。其实到家没有动。打大名我是总参谋长，占城后不会领导城市，我说：“你们先占着，能守就守，不能守就退，我去叫北伐军去”。红枪会都愿叫北伐军来。我和李大山、李步亭到了东明，见到了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三军军长梁寿凯，政治部主任汪静涵，他们答应了我的要求，过黄河北伐，占了濮阳，又继续北打。这时李素若见北伐军来了，就从家出来，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李素若，组织部长李步亭，宣传部长是我，农民部长王亦华，教育部长谢台臣，都是跨党党员。

县党部成立后，做了一件工作，用对土豪劣绅罚款的革命办法筹饷，解决北伐军的供应问题。一九二七年七月，我以县党部的名义，到沙区井店南门里小学里，找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开会，鼓动他们发动农民检举土豪劣绅的罪恶，整出材料到城里去告状，想借此机会发展一批左派国民党员。就在这时武汉发生了“七·一五”反共事件，北伐军撤退，县党部的人都跑了，左派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发展成。我和李素若、成润、李大山随北伐军退到新乡，后来，从汪静涵口中得知刘大风从武汉回来了，我和李大山回到沙区，住在千口我的家里等着。农历八月间，刘大风被顺直省委以特派

员身份派到沙区，向我们传达了中央指示：按新的原则建党，划清国共两党界限，跨党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否则开除党籍。在我家建立了中共濮阳县委，刘大风任书记，李大山组织，我任宣传部长。

刘大风从农讲所带来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彭湃同志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等学习文件，按照他们的经验，我们在农村办起了夜校，通过个别谈话，一九二七年发展了一批党员：王从吾、刘汉生、王卓如、平杰三、蔡兆麟、刘久、赵子云等知识分子入党，接着就在农民中发展了刘玉峰等一大批党员。在李大山传达中央文件后，宣布我们（我、李大山、平杰三）退出国民党。

一九二七年底，河北省转发中央一个通知，说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要原因，是领导权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因此规定知识分子不能当书记。根据中央这个规定，县委书记由刘大风换成了刘玉峰。刘大风当书记时间不长。

赵纪彬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七号

刘汉生同志回忆录

（经本人详细修改）

予北沙区（大名以南新乡以北）建党情况，目前在北京了解情况的有王从吾（中纪委付书记）、王卓如（全国供销合作社付主任）、俞平（高检付检查长，在沙区时叫郭祝三）、平杰三（中央统战部付部长），再一个是我，我的学名叫刘钦沛，现名刘汉生（现为电力部付部长）。

我们五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分别谈谈沙区一带建党和开展斗争的历史情况，我准备谈两段的历史情况。第一段是1927年——1929年前后的建党情况；第二段是1937年抗战开始后恢复党和建立抗日武装的情况。

先讲沙区建党的过程。

根据记忆，沙区（以濮阳、内黄为中心）建党是1927年开始的。

那时在北京上学而参加了共产党的大学生和大名七师教员冯品毅1926年开始在大名七师建党。沙区一带有些青年在该校上学，最早被发展的党员有刘大风（现叫安明，广东省纪检顾问），赵化南（现赵纪彬，中央党校哲学研究室）、李大山（学名李世玮，已死）等。当时我和平杰三也在七师读书。

1927年春，奉军占领了大名城，为反军阀压迫，“红枪会”起来暴动，围攻大名城。战乱一起，七师被迫停

课了，学生都回到家乡。当时组织上决定刘大风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赵化南、李大山在沙区开展党的工作，他们首先搞起了读书会，借读书名义发展党。井店是个大镇子，有集，利用赶集的机会，赵、李经常约七师的同学和其他学校的几个学生在集上聚会，会上给我们讲革命道理，介绍我们看进步书籍，通过这些办法，我们进一步接受革命思想。1927年下半年开始发展党员，第一批吸收入党的千口村有赵子云（当时是七师学生，现在北京农展馆工作），化村有王从吾、王卓如（当时叫王立仁，他俩当时是濮阳高小学生），蔡兆麟（七师学生，温邢固事件中叛变了），井店有平杰三和俞平（濮阳师范毕业，当时是井店小学教员）等。我们入党后，又以千口、化村、井店为中心发展了一些农民党员，建立了三个村的党支部。同年秋刘大风从武汉农讲所回来，又派回原地工作，从此以刘大风、赵纪彬、李大山为核心，加上三个支部主要负责人组成了濮阳县委，县委当时有个秘密刊物叫“飞扬书札”（即濮阳通讯的意思）。县委经常在赵纪彬家的小草棚里开会，由于当时是秘密党，有些混而言之，分工并不明确。一开会，我们这些人都去参加。

井店、化村党支部的情况，由平杰三、俞平、王从吾、王卓如等同志去谈，他们比我清楚；千口党支部负责人是我，下面是我发展的一伙子农民党员。党员都很积极，白天干活、晚上就四处活动。通过亲戚朋友等各种关系开展党的工作，一开会就集合在牛棚或野地里。经我发展的党员，第一批有：刘玉峰、刘思义、刘守训、赵改明、赵喜仲、赵石妮（小名石大奈）、赵合柱（小名赵秃）、刘书妮、刘玉梅等几十人。第一批党员大概是1927年冬天办夜校

时发展的，大概支部也是这时建立的。化村王从吾等同志也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井店也发展了一些党员、知识分子，小市民多，农民较少。千口支部建立后，又向四围发展。例如温邢固、刘邢固、马集、柴村、薛村、破车口、六村、店当、路州、李庄等，均建立党组织和发展党员。

下面谈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向地主豪绅开展斗争情况。

学校停课，我们都回到了家中，赵纪彬、李大山也回千口。在赵、李指导下，我们利用办平民夜校的形式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我家路南就是个学校，我白天在校教书，晚上学校就成了平民夜校，群众称“夜学”。在夜学里，以教农民识字为名，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给他们讲农民为什么会受剥削受压迫，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等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我们自己还编了一个“农民夜校读本”，联系读本识字讲革命道理。那时参加夜学的农民很多，一来就是一屋子。通过夜学，我们引导农民懂得，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要想不受压迫和剥削，非组织起来跟地主豪绅斗不行。慢慢有一批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觉悟很快提高了，有了组织起来进行反抗的要求，提出建立“穷人会”是个好办法。农民也不懂什么叫“农民协会”，也分不清共产党和国民党，他们就叫“穷人会”，“革命党”。许多农民男女老幼都参加了穷人会，穷人会成了团结群众的核心，成了农民之家，很有威信。特别是刘大风从武汉农讲所带回了很多学习材料、小册子，如彭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报告》、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一些公开的左倾刊物，象《新青年》、《创造月刊》等。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海陆

丰农民运动报告》，从这报告中我们得到启发，怎样教育农民，建立组织，怎样进行斗争，看了以后，我们就照着做，穷人会的农民纷纷要求行动起来，就在穷人会的农民积极分子中，在实际斗争考察中，我们发展了农民党员。当时千口和化村党支部的工作是比较活跃的，大的斗争，小的斗争一个接着一个。井店也搞了些斗争，但由于集镇的特点，运动不那么活跃。

我印象比较深的群众斗争，还记得这样几件事：

一件事是：刘二仁的父亲叫年成，因为是个瞎子，都叫他瞎年成。忘记了他跟哪个地主由于地或是借债的事发生了纠纷。瞎年成是个下中农老实人，地主欺侮他，他憋了一肚子窝囊气。我们成立了“穷人会”，要替穷人办事情，听说瞎年成的事后，就准备通过这个事发动群众跟地主斗争。我们教育瞎年成，给他讲你为什么会受气，受欺侮，鼓励他跟地主斗。我们又跟他讲，水帮鱼，鱼帮水，穷人帮助穷人，我们有穷人会，大家都会帮助你，这样他腰杆硬了，站出来找地主说理，穷人会为他撑腰，一斗争，地主不敢吱声了，事情解决了，瞎年成胜利了，出了一口气。由这件事，他感觉到穷人会真好，非要加入穷人会不行。他儿子刘二仁参加穷人会，入党，很受这场斗争的影响。刘二仁表现很好，斗争很好，斗争很坚决，有骨气、有胆量。

第二件事，有个赵合柱，小名二秃子，是拾大粪出身的穷光蛋，沙区枣树成林，有一次二秃和刘法东等几个穷人结伙，晚上到路州村偷人家的枣树，没弄好，叫路州的地主、民国匪起来了，民国看这几人都是穷光蛋，没有油水可榨，就拼命逼迫供信，把他打的死去活来，逼他们说出让他们偷

的？还有什么人跟他们一伙，想让他们供出有点油水的人。二秃、法东不得已，只好瞎编说刘二磨跟他们是一伙的（刘二磨是个中农，日子过得还不错，是个老实人，一句话也不敢多说，一点违法的事也不敢做，只知道干活，）这样一来路州村就集合了民团、会道门的人扛着钢枪、红缨枪、排着队吹着号，从路州到千口来抓刘二磨。他们来抓人时，我正端着碗在大街吃早饭。了解到是怎么回事后，我认为正好可以利用这件事发动斗争。我把喝剩下的半碗糊糊往家一撂，就集合穷人会的人给他们说理抵制他们，不准他们随便抓人。领头来抓人的是路州一个大地主，也是民团团长，名子记不得了。我们对他说：“刘二磨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街坊邻居都清清楚楚，你们这么不讲理，随便抓人是不行的！”千口村在那一带算个出名的村庄，庄子大，人也不大好惹，路州是个小庄子，穷人会出头这么一闹，把路州那帮人吓住了，他们一看不行，人也没抓，垂头丧气又回去了。碰了钉子，这个地主觉得挺丢人的，不善甘罢休，想进一步联合起来，把赵合柱、刘法东几个人送到县里总团的一个什么地方（路州属于内黄县）。结果赵合柱半路上跑掉了。我们听说这个消息后，领着穷人会的农民排着队到路州去，故意找那个大地主要人，他当然交不出人，我们说：“你们是不是把我们的人害了？”这个地主在千口碰了钉子，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想进一步通过县里敲竹杠，结果二秃子他们一跑，我们这一反攻，弄得他束手无策，软了下来。我们要求他赔礼、道歉，他无可奈何，只好答应我们的要求。群众高兴地说：“他们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一胜利的消息一传开，“穷人会”在那一带算出了名了。过去我们发展农民协会会

员是先发展本村的，然后通过他们再去串连周围村庄的人（背着箩筐满街串），现在就不用出去找了，周围村庄的人纷纷跑来找我们，说：“我们要加入穷人会。”农民协会的影响迅速扩大，威信大大提高。

第三件事，千口有两个大地主是本村村长，掌管全村政治、经济大权，一个叫赵绍福，一个叫刘跃宾，他们向农民逼租、逼债、派捐要税，农民很恨他们。那时候穷人会的影响已经很大，全村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加入了，很有力量。我们有计划地组织农民跟他算账，也就是清算款税。我那个家庭在当时来说也是反动的，对我搞这些事情很反对，我参加活动受到家里限制。但是我想各种办法跟父亲斗，始终没有让他限制住。在这次算账过程中，我没有出面，而是在群众中暗中指挥，领头的是几个农民党员，刘玉峰、刘思义、赵改明、赵喜仲等。他们带着穷会会的农民跟刘跃宾、赵绍福算账，跟他们讲理，农民们说：“你们的捐税太苛刻了，出钱养民团是为了防土匪，我们是穷光蛋，土匪抢我们的什么，让我们出这钱不合理。”一群人把他们围在家里讲理。以往谁也不敢惹他们，一跺脚，谁也不敢吱声。现在公然包围他们，在他们家里吵闹，甚至骂、嘲笑他们，不但闹了一阵，而且此后抗捐抗税，什么“民团捐”“盐池税”等都不给他们出了。这一算账，把地主的威风打下去了，农民协会影响更大了。这两个地主不服气，企图报复，他告到民团总局（在温邢固）。民团总团长蔡洪宾（蔡兆麟之父），他说：“你们都不出捐，将来叫我们这个民团吃啥？”因此就派民团到千口来挨户强性去要，大家不给，结果就把农民李良妮、李庆妮抓去。问：“民团捐你

们拿不拿？”这两个人看到别人都不拿，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就顶着不拿，民团想借此向穷人会反攻，整我们。穷人会立即要求他们放人，并且说：“你们抓人我们也不出捐税，本来就不该派我们穷人捐税。”民团原想通过抓这两个人吓唬吓唬，让群众顺顺当当把钱拿出来，没想到千口的穷人会这么厉害，继续抗捐抗税，并且说：“你们不放人，我们就要闹你们的局子！”民团没了办法，决定把李良妮，李庆妮押到县里去打官司，千口是他们往县里押运人的必经之路。穷人会说，你们送，我们昼夜站着岗，放着哨，你们什么时候送，我们就什么时候劫案，咱们就干，这一声张，他们也不敢往县里送了。钱没有到手，事情也没有弄出个名堂，民团只好把人放了。这次斗争又胜利了！李、李被放回以后，对穷人会感恩不尽，觉得穷人会真是顶事，都要求参加穷人会，以后这两个农民还入了党。

象这样斗争的事还有许多。从此村里凡是排难解纷的事，都来找穷人会，穷人会一天到晚出面斗地主，反捐税，反恶霸，打不平，团结互助，为大家做好事。

以后斗争规模发展得越来越大，化村和千口村是一个行政区。（均属薛化庄），两个村的工作都很活跃，每次斗争我们都有联系，这次反捐税，千口是反刘跃宾、赵绍福，化村是反王立三，都是头号的地主豪绅。斗争已经发展到矛头对着民团总局，两村就商量联合斗争，一起斗蔡鸿宾。（是整个薛化庄的地主豪绅代表，民团的总团长），并通过斗争这个前台傀儡，打击他的后台刘润之（是教育局长）和温振刚，刘润之是濮阳有名的一个地主豪绅的代表，濮阳城里出西门的第一个，在井店以东，县城以西约七十里那一带说话

是算数的，很有势力。温振刚是温邢固的一个恶霸地主，在那一带也很有势力。他们俩支持蔡鸿宾当了薛化庄民团的总团长。沙区一带建党以后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引起了他们的恐惧，那一带有名的地主豪绅逐渐联合起来，而且都有武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准备把几十个庄子联合起来，斗争蔡鸿宾，给那一带地主豪绅以打击，这次行动从和蔡鸿宾算账开始，穷人会把蔡围在民团总局的一个小屋里，不准他乱说乱动，门口站岗放哨，群众可以随便出入，其他人不能接近。这次算账我和王从吾是总指挥，我们不露面，就在家庙（民团总局住地）北边一家的小草屋里指挥。群众把蔡围了几天几夜。经过清查账目，查出他有很多贪污。群众提出了许多条件，要求他赔偿，要求今后不再向穷人摊派捐税等等。在群众斗争的威力下，蔡狼狈不堪，被迫答应了这些条件。经过这场斗争，把蔡和地主豪绅的威风全打下去了，群众胜利了。蔡被斗以后，恼羞成怒，打算报复，他背着群众偷偷跑到县城去告状，诬蔑农民群众在乡间搞暴动。这时县委已经把平杰三、蔡兆林调到濮阳城里搞上层工作。蔡鸿宾到城里以后，一方面告农民协会的状，一方面去找他的儿子蔡兆麟，因为他知道他儿子是参加革命党的，是跟我们一起的，他想拉他儿子揭发我们。他还找了他家的亲戚来逼蔡兆麟，据说打了蔡兆麟的耳光。这时，当革命危害到个人利益时，老子被群众斗争后，蔡兆麟动摇了，当了可耻的叛徒，他跑到一个地下党员张永才的家里，把党的秘密刊物《白杨书札》等骗走了，交给了敌人。这时蔡鸿宾、刘润之等那一带的地主豪绅正集合在濮阳城里告状，他们得到《白杨书札》，如获至宝，立即把情况报告了县长。敌人拿到了